

# 基于“借词”“译词”翻译策略的文化负载词译法考察

—以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文明词和文化词为例

陈 晓 淇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Loan-words and Translation-words: Ethnic and Material Culture-loaded Words in Natsume Sōseki's *I Am a Cat*

CHEN Xiaoqi

## Abstract:

Ethnic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material culture-loaded words are two categories of vocabulary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loan-words and translation-word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changes in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these two categories of words in *I Am a Cat* in recent times.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these two types of words change depending on the judgment of translators and the changing times. The reasons why these changes arise are analyzed in the concluding remarks. In general, the strategy of transliterating words is more commonly used because Chinese prefer to translate a foreign concept when it is introduced.

**Keywords:** 《我是猫》、描述性翻译研究、借词与译词、尤炳圻

## 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

翻译是指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从语义到语体再现原语信息<sup>1)</sup>。而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着该社会的文化。Nida (1971) 指出, 如果社会的文化焦点 (Cultural focus) 不同, 语言也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而译者在翻译时, 必须做出一定的语法上和词汇上的调整<sup>2)</sup>。

1) 谭载喜编《新编奈达论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第11页。

2) Eugene Albert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 ナイダ:《翻译学序说》, 開文社出版。

Larson (1984) 也指出了文化焦点的存在, 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焦点, 词汇总是朝着特定文化中的焦点方向发展, 变得日益详尽和复杂。如果文化间的焦点相似, 那么不同语言词汇间语义对应和交叉的情况十分普遍。相反, 如果文化间的焦点各异, 那么不同语言的词汇间语义冲突甚至空缺的现象会十分突出, 这也会造成翻译的难度的增加<sup>3)</sup>。许国璋将这些词汇定义为文化负载词 (Culture-loaded word)<sup>4)</sup>, 廖七一 (2000) 解释文化负载词为标志着某种文化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 直接反应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 有别于其他民族独特的活动方式的词汇<sup>5)</sup>。

在翻译时, 遇到这些标志着特定民族的文化中的特有事物或行为的词汇时, 要从源语言中找到形式和内容都完全一致的表达十分困难。对于这些词汇的翻译, Nida 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这两种不同的基本导向。其他的翻译研究者也提出了类似的两极, 如中国的胡以鲁的“译”和“借”、鲁迅的“信”和“顺”、傅雷的“神似”和“形似”等, 国外的西塞罗 (Cicero) 的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解释员式翻译 (意译) 和演说家式翻译 (直译)、Lawrence Venuti 的自国化和异国化的翻译策略等。在进行译法的历时性考察时, 大多数研究者们都会将各类翻译方法归类为两个大类, 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本文选取在综合研究素材的特点上, 选取胡以鲁 (1914) 在《庸言》杂志上提出的“借”和“译”的概念, 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进行归类。

本文的研究素材是源语言为日语的《我是猫》的中译本, 选取的译本的出版时间为1958年至2020年, 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积极与世界进行交流, 大量吸收外来词汇的阶段。这些外来词汇中, 有一部分为特定民族独有的词汇, 有一部分为近代以来所有民族开始共有的 (即以近代科学相关概念为基础诞生的) 词汇, 这两类词汇在广义上均属于文化负载词, 本文将前者命名为“文化词”, 后者命名为“文明词”, 分别对这两类词汇的翻译方法的变迁进行考察。

## 二、借词和译词的翻译策略

本文基于语言学家胡以鲁 (1914) 在《庸言》杂志上提出的“借”和“译”的概念, 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进行归类。

在进行历时性考察目标语为汉语的日语词汇的翻译时,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日语借词”这一专业术语。因为在近代新出现的中国词汇中, 有很大一部分代表“文明”、即与近代物质生活相关的词汇, 也是本文中的“文明词”, 这些词汇是在西方产生的, 经由日本的汉译传入中国。此外, 对于本研究来说, 采取“借”和“译”的分类方法, 也能有效避开中日同形词及中日同形异义词

---

1971, 第77页。

3) Mildred L. Larson: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p431.

4) 许国璋: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现代外语》, 1980。

5)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译林出版社, 2000, 第232页。

的翻译方法归类的难题。该难题即：将日语原文中的汉字词汇的汉字完全照搬到汉语译文（或是仅做了繁体到简体的变换）的行为能否算作翻译；以及中日同形异义词在采取这一方法时，属于改写（自国化）还是属于借用（异国化）。沈国威（2020）在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的研究中，详细的描述了“借”和“译”的翻译方法的区别，本文基于其分类方法，结合《我是猫》的翻译方法特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胡以鲁称“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两字不可通也。”在传统的“从其义”的译词外，胡以鲁又提出了“袭用其音”的借词，即特指音译词。但胡以鲁在《论译名》中将源语言为日语的词汇的翻译称为“译词”。孙常旭（1956）指出这一种词汇为“借取书写形式的特殊借词”，即“日语借词”。<sup>6)</sup>这是因为汉语具有音义可以脱离的特点，并且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有着长期文化交流，因此出现了这类“不从语音形式借取，只取书写符号的特殊现象”。此后，马西尼（1997）将借词划分为借音词（phonemic loans）以外还存在借形词（graphic loans）。他指出，借形词一般指吸收了外语词的意义又采用了外语词的书写形式的词汇，但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当两种语言具有相同的表意文字系统时，词的意义和形式直接发生关系，不必借助语音<sup>7)</sup>。而汉语与日语共同使用汉字这一书写系统，因此与欧洲各国借用字母一样，汉语与日语也存在着“借形词”的例子。如《我是猫》中出现的“金魚𩺰”一词，各译本如下：

尤炳圻：金魚𩺰子

刘振瀛：金魚𩺰

于雷：喂金鱼的麦糠

曹曼：喂金鱼的麸皮

林少华：金魚𩺰

参考日本小学馆的《新选国语辞典》，“金魚𩺰”特指充当金鱼饵料的烤“𩺰”<sup>8)</sup>。“𩺰”为日本传统食物，是由小麦粉的面筋部分制成的食物。参考《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中文的“𩺰”为小麦磨面筛剩下的碎皮，即小麦的外壳部分。各译本均未点出“面筋部分”这一含义，而是移植了“𩺰（麸）”这一汉字。相较于于雷、曹曼这一词汇的解释，即“译”词化翻译手法；刘振瀛、林少华是选择了借形的翻译手法。将这一词汇直接照搬如汉语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目标语言的读者造成一定的理解负担。但是正是汉字的存在，才令文化负载词在中日翻译中变得“可完全对等地翻译”了起来。

此外，王力（1957）提出有一种特殊的意译可以归类为借词，即将起点语言的一个词（或是

6) 孙常旭：《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第301页。

7)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153-154页。

8) 原文为“金魚の餌(えさ)にする焼き𩺰”。

一个成语)用相同的构词方式照搬到目标语言中的摹借(calque)<sup>9)</sup>。如《我是猫》中出现的“越中禪”一词,林译为“越中兜档布”。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对“译”和“借”的翻译方法定义如下。(1)借用日语假名的发音进行翻译(借音)、(2)借用日语汉字进行翻译(借形)、(3)借用英语字母(借形)进行翻译、(4)在借用外语的发音或是汉字的基础上,对词汇添加注释(加注)、(5)逐字逐句翻译(摹借)(6)借用外语的发音或是汉字的基础上对词汇进行解说(词汇加工)<sup>10)</sup>这六种翻译方法分为“借”词的翻译方法,(1)改写、(2)省略、(3)创造新的词汇(或在创造新的词汇的基础上加以注释)、(4)解说这四种翻译方法分为“译”词的翻译方法。

### 三、文化负载词的译法考察

本文的研究素材为《我是猫》,为夏目漱石的处女作。自1918年周作人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我是猫》<sup>11)</sup>、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译本<sup>12)</sup>、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全译本后,截止2020年4月,根据笔者调查,译本数量已经达到136种<sup>13)</sup>。《我是猫》相较同期的其他日本文学作品而言,具有译本数相对较多、流传相对较广的特点,此外,其语言朴实易懂,故而对读者的年龄、学历、职业等没有较多限制。因此,在考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时,其中译本是优秀的考察材料。本文选取其中5册译本作为素材进行考察,分别为《我是猫》的第一本全译本胡雪、尤炳圻译本;考虑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二十一世纪十年代各选取了两本不同译者的译本,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受众较多的译本刘振瀛译本和于雷译本;以及近年来较为受欢迎的译本曹曼译本和林少华译本。根据出版顺序排序,六本译本顺序如下:(1)胡雪、尤炳圻译本(1958)(以下简称“尤译”<sup>14)</sup>)、(2)于雷译本(1993)(以下简称“于译”)、(3)刘振瀛译本(1994)(以下简称“刘译”)、(4)曹曼译本(2015)(以下简称“曹译”)、(5)林少华译本(2020)(以下简称“林译”)。

夏目漱石被誉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幼时起便在汉学塾学习汉文,有多篇汉诗问世,对汉

9)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重版,第502页。

10) 将日语中的“○さん”翻译成中文的“阿○”或“老○”、“小○”的翻译行为,在本文中不属于改写,属于“借”词的翻译方法。此外,参考王力《汉语史稿》中关于“借词”的定义,将“アメリカ”翻译成“亚美利加”为借音,其翻译成“美国”也属于借词,即在借音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表示类别的汉字,创造一个新词汇。

11) 周作人在1918年4月18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中进行了以“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题的讲演,自此,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猫》被中国读者所熟知。该演讲中,周作人第一次系统性的介绍了当代的日本小说。

12) 1936年1月于鳳文書院(东京)出版,程柏軒、罗茜翻译。该译本为摘译,故不列为分析对象之内。

13) 参考笔者论文《マクロ視点における民国期から現代中国にかけての翻訳規範の変遷》(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 第11号),第18-35页。

14) 该译本基于尤炳圻于1942年11月5日起在《庸报》连载版本,经过胡雪的大幅度修订后出版。

语典籍的了解可谓深厚。此外，他与禅宗也有很深的渊源，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他便对传统文化和思想有了很深的了解。夏目漱石对时代的变化极其敏感，其《文学论》可谓是在英国留学的成果的结晶，在其中他对“所谓汉学的文学”和“所谓英文的文学”的差异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而其中年出道的小说作品《我是猫》中也有他儒学、禅家思想和西洋思想交织的体现。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书中除了“陣笠”等传统日本文化的词汇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典籍的词汇、佛教相关的词汇和“フロックコート”等以西洋文明为基础的，基于近代科学技术而产生的“文明”词汇。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上述独属于某些或是某类民族的词汇归为“文化词”，将趋于各民族共同的词汇归为“文明词”。

本文基于 Toury (1995) 为描述性翻译研究时提出的方法论，即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形成转换 (shifts)，确认原文与译文片段“耦合对子” (Coupled Pairs) 的关系，尝试对潜在的翻译概念进行概括和总结<sup>15)</sup>。选取《我是猫》中的文化负载词且进行归类后，将它们与 5 册译本进行对比形成的耦合对子的基础上，结合对“借”词和“译”词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探讨各译本的翻译特点及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的变化。

## 1. 文化词的译法考察

基于上述对夏目漱石的思想的讨论，本文中的“文化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与佛教相关的词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词汇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汇。

首先从佛教相关的词汇看起。夏目漱石本人受禅宗影响很深，其本家便是信奉“净土真宗”的家庭。此外，在学生时代他便对日莲宗有一定了解，翻译了铃木大拙的美国演讲稿和《方丈记》。而禅宗为佛教的分支之一，这也就解释了《我是猫》中出现的佛教文化词的原因。

自汉武帝征服西域后，中国便开始大量翻译佛教典籍。从汉末的佛经翻译偏于“依文转写”，即“未熟的直译”，直到三国至西晋时期的，翻译数量众多，译文由最开始的“求调畅易读”，即“未熟的意译”，到玄奘时期已经达到“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境界<sup>16)</sup>。经历了近两千年的翻译实践，直至今日，与佛教概念相关的词汇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翻译，其翻译方法也有了一套固定的法则。大部分的佛教概念都在汉语中找到了对应的词汇或是形成了固定的译名，但其中仍有一部分词汇采取音译。如玄奘在实践佛经翻译时指出的“五不翻”，即遇到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这五种情形时不进行意译而保留其音。以梵文“Bodhi”的译词“菩提”为例，其具有特殊意义（生善）而采用了音译。这一类音译词汇已经融入汉语，并在较早的时期传入了日本。因而对于《我是猫》中出现的“菩提所”，译者有直接移植其汉字的可能。

尤译：祖祠

15)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001; ジェレミー・マunday: 《翻訳学入門》，みすず書房，2009，第172页。

16)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商务印书馆，2014，第175-177页。

刘译：菩提所  
 于译：家庙  
 曹译：寺院  
 林译：菩提所

而对于这一词汇，译者所采取的译词并不相同。大部分的佛教概念都在汉语中找到了对应的词汇或是形成了固定的译名。因而对于佛教文化词汇而言，出现译名变化的原因并非是由于这一概念逐渐为汉语所吸收因而产生了译名的变化，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一原因是出于各译本的偏好问题。综合佛教文化词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表3.1.1 佛教文化词

	1958尤译	1993于译	1994刘译	2015曹译	2020林译
借用数量	12	1	17	8	19
翻译数量	24	35	19	28	17

《我是猫》一书属于文学翻译，且佛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教典籍翻译活动，因此其翻译方法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而影响在译本中这一类词汇的翻译方法产生不同，更大可能是因为译者、编辑及出版社的偏好。

佛教文化词外，还有一类翻译方法的变化与近百年内的历史性原因较小的词汇，即中国文化词。

明治中期汉学在日本蔚然成风，因而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中汉学的典故亦频频可见。夏目漱石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大作家”，其处女作小说《我是猫》中也出现了一部分汉学典故。在本文中，将这部分汉学典故称之为中国文化词。

小说中出现的中国文化词里，有直接引用典籍的词汇，如薰風南より来って、殿閣微涼を生ず（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千金の子しは堂陲に坐せず（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也有引用典籍后进行化用的词汇，如小说中，在迷亭先生创作俳句之后，独仙先生以“一竿風月閑生計、人釣りす白蘋紅蓼間”相对。这一句化用了陆游的《感旧》中的“一竿风月老南湖”，各译本也均将其处理为“一竿风月闲生计，人钓白萍红蓼间”。此外，在一些并不明显的化用上，各译本之间的处理方法便有所偏差，如“十年一狐裘”一词。

尤译：专门了十年，却只落这么个样子

刘译：十年仍是一身敝裘

于译：“十载一狐裘”十注（《礼记·檀弓篇》，“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曹译：“一狐裘三十年”

林译：十年一狐裘十注（十年一狐裘：齐国宰相晏平仲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之久。见于《礼记·檀弓》。）

如于译和林译的注释所注，这一典故出自于《礼记·檀弓》。原典中为“一狐裘三十年”，而夏目漱石引用时为“十年一狐裘”。关于将其译为“三十年”还是“十年”这一问题上，译本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

关于译文对原文的改动，贝尔曼（2004：280）指出，如果对原文词汇做出改动的话，可能会存在原文内在意指体系的破坏。结合原文的上下语境来看，这一词汇为多多良先生评价主人研究英语“十年一狐裘”，收入却不如资本家。原文有可能是在结合主人自身的情况下，因而将汉典的“三十年”改为了“十年”。尤译、刘译忠实于原文的“十年”，不点出原典及“狐裘”，对其进行了模糊化的改写处理。于译、林译在正文中遵照原文译为“十年”，但注释中标注了原典以及“三十年”这一区别。曹译则引用原典指出了“三十年”这一点。

表3.1.2 中国文化词

	1958尤译	1993于译	1994刘译	2015曹译	2020林译
借用数量	18	17	13	7	22
翻译数量	58	59	63	69	54

综合中国文化词的数据来看，其变化趋势并不明朗，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显。从译本的特点来看，翻译时间最早的尤译更倾向于自国化，即将文化负载词处理成“译词”<sup>17)</sup>。对比在此后出版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刘译和于译可以发现，于译倾向于使用目标语言汉语中存在的表现对应，而刘译倾向于借用源语言的字形或发音。作为翻译时间接近的刘译和于译，其在翻译方法上的偏好推测与译者的身份有关。刘振瀛作为日语教师，更侧重于翻译的词汇的准确与否，而于雷作为作家、诗人，则更倾向于将词汇背后的文化传达给读者们。紧接着近代出版的曹译和林译相比较，可以发现曹译更倾向于将词汇处理为“译词”，林译更倾向于将词汇处理为“借词”。这与林少华本人“审美忠实”的翻译观也十分相符<sup>18)</sup>。结合《我是猫》中的耦合对子来看，原文的宗教文化词大多仅由汉字构成，给译者提供了借词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国家对于佛教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融入各个语言的佛教用词也不尽相同，且哪怕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汉字）、使用频度和接受频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原文中存在仅由汉字构成的宗教文化词，但将其照搬至译文中，仍然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理解障碍。

17) 参考笔者论文《夏目漱石『吾輩は猫である』の中国語訳について——1942年訳と1994年訳の懸隔——》（院祭新常態2020），第141-150页。

18) “而我为了缩短日本人和中国的审美距离，有时就在允许的范围内微调一下，即多放几克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美化，而是一种信，一种忠实，即审美忠实。这在范围翻译上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林少华：《落花之美》，青岛出版社，2013，第138-139页。

在上述对译本的特征的讨论的基础上，对《我是猫》中剩下的文化词进行整理，可以看到以下的变化。

表3.1.3 日本文化词

	1958尤译	1993于译	1994刘译	2015曹译	2020林译
借用数量	44	34	47	33	50
翻译数量	114	124	111	125	108

民族文化词的翻译方法会根据译者的偏好产生变化，但也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民族文化词的翻译方法有微弱的减少的趋势。总的来说，在原文的词汇的汉字、发音对于目标语言读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情况下，如果该民族文化词完全由汉字构成的，译者会尽量采用借用（或是在借用的基础上加注释）的翻译手法；该词汇含有假名的情况下，译者也尽量采用利用该词汇的汉字、或是假名的发音进行造词。

但原文的汉字、发音对读者而言是否能够理解，这一尺度并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之中有一段模糊的界限，而是否采取原文的汉字、发音，会根据译者的翻译风格而出现变化。如原文中“かち山の御話”一词的翻译，各译本的翻译就体现了译者的风格：

尤译：兔子报仇的故事

尤译再版：兔子报仇的故事

刘译：《咔嚓咔嚓的山》

于译：《兔子复仇记》

曹译：《咔嚓咔嚓山》十注（咔嚓咔嚓山：日本中世纪民间故事，婆婆被狐狸害死，兔子为爷爷报仇。）

林译：“喀嚓喀嚓山”十注（这是宝町末期流传的故事，大意讲婆婆被狐狸杀害，兔子为爷爷报仇。）

尤译与再版在民族文化词、包括下节的物质文化词的处理上，仅存在繁体字到简体字的变换。原文中为主人的两个女儿向雪江询问她会为她们讲述什么故事，其中一个女儿问道，“还讲‘かち山の御話’吗？”作为日本独有的民间故事的名称，这一词汇对于读者而言是有一定文化障碍的。尤译、于译面对这一词汇选择了不使用原文的汉字及发音，刘译借用了原文的发音和汉字，曹译和林译在借用的基础上附加了注释。

此外，这一尺度的判断也与译者对于源语言的掌握能力、源语言的文化背景的理解度有关。如“天璋院”一词，各译本的译名如下：

尤译：天璋王爷

尤译再版：天璋王爷

刘译：天璋院十注（德川三代将军家定的妻子，藩侯岛津齐彬的女儿，德川家定死后，她落发为尼，号“天璋院”。）

于译：天璋院女道士十注（天璋院女道士：（一八三七—一八八三）名敬子，与鹿儿岛领主同宗的岛津忠刚之女，嫁给德川家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家定死后出家，佛门名为天璋院。）

曹译：天璋院十注（天璋院：即“笃姬”，岛藩主岛津齐彬的女儿，安政三年（1856年）嫁给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五年后家定死亡，她削发为尼，号“天璋院”。她在幕府末年骚乱和明治维新初期发挥了很大的斡旋作用，被誉为秀外慧中的杰出女性政治家。）

林译：天璋院十注（天璋院：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的养女（1839-1883）。嫁于德川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家定死后皈依佛门，称天璋院。）

可以看出，除尤译外，各译本均点出了“天璋院”一词的女性身份，尤炳圻和其他译者对于“天璋院”这一身份的认知有一定区别。关于这一点，他在“译者的话”中也有提及，称自己对《我是猫》中的日本风俗习惯等还不够了解。<sup>19)</sup>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尤译中也有一些详尽的注释，是其他译本没有提到的。如“韩国统监”一词，仅尤译指出这一词汇为职位，1904年由伊藤博文担任。

此外，原文的汉字、发音对读者而言是否能够理解的尺度也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如“谣”一词，仅尤译将其翻译为“作诗”，之后的译本均以“谣曲”对应。

## 2. 文明词的译法考察

物质文化词包括物质经济生活、日常用品及生产或生活工具、科技文化及设施等词汇。这些词汇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在近代以来经过了大量的翻译，出于应对译词急速增长和高速传播的需要，其中一部分文化负载词由组织规定了其对译词汇（如术语中的《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术语标准编写规定》等）。在以日语为源语言、汉语为目标语言的翻译中，物质文化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阿部川餅”、“汁粉”这类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文化色彩的物质文化词，以及“フロックコート”、“トウイード”这类具有鲜明的第三国民族文化色彩的物质文化词，还有“鉄扇”、“銅壺”这类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不具有文化障碍的物质文化词。

19) 见1942年11月2日，《庸报》第三版中《促成中日文化交流——夏目氏名作〈我是猫〉本译报载》一文。“……其实我那时虽留学在日本，对于日本事情，毫无所知。因为妄想添加蛇足，展转翻寻，才使我多少知道了一些日本现代文学乃至风俗习惯的轮廓。对于俳谐、落语、江户文艺，乃至禅宗等等的感到兴趣，也实在是始于此时。随读随即发现《猫》里面有许多以为已经了解而其实并未能了解的地方。便在今日，一定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完全了解罢。钱先生的“完译”的过分的赞许，那里敢当呢。”

表3.2 物质文化词

	1958尤译	1993于译	1994刘译	2015曹译	2020林译
借用数量	57	47	72	57	87
翻译数量	235	245	220	235	205

对于物质文化词，译者一般倾向于采取意译。这是由于意译产生的词汇简单易懂且容易记忆，因此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物质文化词汇的译词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在借用的基础上，在词汇之后加上一个用于表示大类的词汇。这一造词方法古已有之，如将“アメリカ”翻译成“美国”等。在各个译本中均可见到这一造词方法，如对于“正宗”一词，曹译为“‘正宗’酒”；“小倉”一词，尤译为“小仓布”等。二是利用原词汇的发音或汉字，制造一个目标语言读者能够理解的词汇，如“三盆”曹译为“和三盆糖”，“結城紬”林译为“结城捻线绸”等。三是用源语言中存在的词汇进行改写，如“自然薯”各译本均译为“野生山药”；“汁粉”尤译为“湯糕”、刘译为“小豆粥”、林译为“年糕小豆汤”等。

而在物质文化词中，还有一种特别的物质文化词。这一类物质文化词发源于近代西方，是与近代科学相关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有上文中说到的造词方法，但在本文中，更常出现的是“借”词化的翻译方法。这些借用存在借用汉字、发音及在借用的基础上加注这两种方式。在借用汉字的情况下，各译本的译名均相同，但是在借用发音的情况下，各译本的汉字也会存在不同。如“ワットマンという紙”一词。

尤译：瓦特曼纸

尤译再版：瓦特曼纸

刘译：华特曼纸+注（一种英国特产的水彩画纸）

于译：图画纸

曹译：华特曼纸+注（英国老品牌水溶性色彩画纸。）

林译：瓦特曼纸+注（瓦特曼纸：以麻为主要原料的高档绘画纸。）

除了于译属于“译”词化的翻译方法外，各译本均采取了借音的翻译手法。但各译本的音译从“瓦特曼”到“华特曼”不等。此外，在源语言为英语、日语采取借音的物质文化词中国，根据译者的理解不同，译词所指代的物品也会出现不同，如“アンチピリン”一词。

尤译：安知必林+注（安知必林，一种退热镇痛药）

尤译再版：安知必林+注（安知必林，一种退热镇痛药）

刘译：氨基匹林+注（退热镇痛药）

于译：阿斯匹林

曹译：阿司匹林

林译：安替比林十注（安替比林：Antipyrine，当时使用的镇痛解热剂。）

参照日本小学馆的《日本大百科全书》，该词汇的英文名为 Antipyrine。六译本的译名的英语也有所不同。参照《医学衷中参西录》（张锡纯：天津新华印书局，1909），尤译及再版的安知必林为 Antipyrinum；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第二部》（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刘译的氨基比林为 Aminophenazone，曹译的阿司匹林为 Aspirin，阿斯匹林为阿司匹林别名；见《有机化学》（龚跃法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林译的安替比林为 Antipyrine。四种药品均有退热镇痛的功效，但与原文所指代的物品并不完全一致。

综合表中的数据看来，在物质文化词中，借用数量存在微弱的增加的趋势。

#### 四、结语

本文基于“借”词化的翻译方式和“译”词化的翻译策略论，对夏目漱石《我是猫》中的文化负载词中的民族文化词和物质文化词进行了考察。

在民族文化词中，本文先就佛教文化词这一不受时间影响的特殊文化负载词进行了讨论，对各译本的翻译特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民族文化词整体进行了分析。综合这两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民族文化词的翻译方法会根据译者的偏好产生变化，但也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原文的词汇的汉字、发音对于目标语言读者来说是否可以理解这一尺度，会随着这一词汇在汉语中的翻译频度而变化，也会随着译者的判断而变化。译者的判断与其翻译风格有关，也与其对于源语言的掌握能力、源语言的文化背景的理解度有关。

在物质文化词中，本文重点讨论了词汇随着时间（在汉语中的翻译频度）变化而产生变化的例子。综合对比民族文化词和物质文化词这两类词汇，可以看出，物质文化词中采取“译”词化的翻译方式词汇要多于民族文化词。这与物质文化词本身的词汇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夏目漱石《我是猫》于1905年（明治38年）在杂志《杜鹃》连载，于1906年出版。而在明治时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相关概念的时期，经历了参考中国出版的近代科学书籍，到独立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的过程。自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日本学者十分注释中国翻译的西方科学书籍，翻刻了不少由传教士编撰的中文科学书籍，为日本人民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十年代，这一形式便有了翻转。在中国困于洋务运动踟蹰不前时，日本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日本学者已经可以脱离传教士翻译的原本，独立地翻译、编纂不同语言的西方科学书。大量的近代科学相关的概念被引入日本，拥有了日本的“译名”。近代化的思想和物质进入日本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我是猫》的小说中，成为本文中的“物质文化词”，即“文明词”。

而相较于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在日本遍地开花，其在中国却不温不火。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中国和日本的翻译理念的不同。中国历来重视书籍的质量，因此在出版外文书籍的翻译

时，对其译文的水平也有着很高的要求。如在当时，严复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写道：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sup>20)</sup>

在一百年后的现在，严复的“信达雅”已经成了中国的翻译标准之一。而同期日本译者在谈及翻译时，则还处于对是否还原原文、如何还原原文的商讨之中，还未提到“雅”这一高度。在严复提出“信达雅”时，时任日本海军编修书记，有过八年英语及俄语的新闻翻译经验的二叶亭四迷在谈及翻译时，谈到过以下的标准：

我认为，必须理解原文的音调，将其照搬至译文中。在这个过程中，不能随意删除任何一个句号或是逗号。如果原文中有三个逗号和一个句号，译文也尽量保持一个句号和三个逗号，与原文的相符。<sup>21)</sup>

虽然二叶亭四迷在下文谈到自己根据这一标准翻译的文章“信屈聱牙”，但终究还是在“如何还原原文”的框架中。

两国对于出版译文的标准不同，使得近代科学知识在两国的普及速度产生了影响。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初，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在中国才开始盛行起来，中国掀起了日本书籍的汉译高潮。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引起了一部分中国学者的重视，他们开始提出引入日本书籍、翻译日本书籍的重要性<sup>22)</sup>。以科学教科书为主的日本的教科书被大量出版<sup>23)</sup>，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日语学术辞书，如汪容宝等编著的《新尔雅》。由于日本学者们翻译西方科学相关概念时，一般采取两种办法，即音译或使用汉字创造意译，且中国和日本共用汉字这一套书写系统。因此在引入西方科学相关概念时，出现了借用日本的汉字“译名”的方法，这使得翻译变得简便起来。这也是近代汉语中出现“日语借词”这一概念的由来，即本文中物质文明词出现“借”词化的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引入外来概念时并为其寻找对应词汇时，日语中还存在“音译”即借

20)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1898。

21) 见二叶亭四迷的《余が翻訳の標準》，原文为“須べからく原文の音調を呑み込んで、それを移すようにせねばならぬと、こう自分は信じたので、コンマ、ピリオドの一つをも濫みだりに棄てず、原文にコンマが三つ、ピリオドが一つあれば、訳文にも亦ピリオドが一つ、コンマが三つという風にして、原文の調子を移そうとした。”中文为笔者拙译，参照《二叶亭四迷全集 第一、二、三、四、七卷》，筑摩書房，1984。

22) 如康有为《戊戌奏稿》敬呈书目序附第3页中提到：“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可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及东事将兴，举国上下，咸昧日事，若视他星。臣曾上书日本变法已强，将窥辽东，先谋高丽，大臣不信，狼以疏浅，九门深远，格不上达。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日本之小国，贸然兴戎，遂至败辱，则太不察邻国，误轻小帮之所由也。”

23) 参见王冰，《明清时期（1610-1910）物理学译著书目考》，《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5期，1886-1901年，在100种物理学译著中，明代出版的只占3种，其余皆为清代翻译，且1891年至1910年出版的数量最多。

用这一方式。而且这一方式被广泛运用，占据了极大一部分比例。虽然由于在近代中国，拼音字母的广泛使用使得外来词汇的音译也出现了增加的趋势，但总体来说，意译还是具有强大的优势。由于意译具有简单易懂、容易记忆的特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因此，音译仍无法撼动传统的意译的优势，汉语遇到新概念时，依旧更倾向于采取意译的方式引入。相较于日本，汉语中意译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面对日语中采取“音译”的词汇，汉语一般也会为其寻找意译词汇。

此外，在汉语中，定着下来的音译的外来词汇只有很少一部分。音译在汉语中只能作为“权宜之计”，随着这一概念的广泛出现，会由一个类似的意译词汇出现代替这一音译词汇。如在科技术语进入中国的初期，译者很难找到合适的译文，音译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成为主要翻译方式。但随着科技术语不断地被译语语言文化吸收融合，意译比音译更具优势。如gelatin原音译“直辣的尼”，现意译“明胶”；protein原音译“布路的以尼”，现意译“蛋白质”；glucose原音译“哥路哥司”，现意译“葡萄糖”等。很多科学术语，在科学知识普及的过程后，其音译名变成了我们现在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术语。这些术语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相互借鉴、交叉融合，受到多个学科领域的相互影响，才演变成为近代常用词。

对于民族文化词而言，除了佛教词汇这一类在中国和日本都被广泛使用、融入了人民生活的词汇之外，剩下的词汇均为日本独有的，即日本文化词。这一类词汇相较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而言，使用频率要低得多，因此在本文中，其音译的“权宜之计”（如“咔嚓咔嚓的山”等）相较于物质文化词，仍占据多数。

这就能解释为何物质文化词中，采取“译”词化的翻译方式词汇多于“借”词化的翻译方式，且这个比例大于民族文化词。但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可以预想，今后对于这两类的文化负载词，采取“借”词化的翻译方式的译者还会继续增加。

